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构建研究

蔡燕 赖冠余

摘要：最近几年，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时有发生，为了案件侦办和救助被害人的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积极推动各地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建立健全。当前，我国域内外对这一机制的探索构建已有突出实践，并形成一系列可供参考和推广的宝贵经验。本文将对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概念、提出以及在我国的发展进行理清，试论对其开展构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性，在考察域内外实践情况的基础上，总结出在构建过程中可能需要遵循的方向以及大致的机制运行路径。

关键词：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构建研究

最近几年，社会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持续增加，其中性侵害给未成年被害人带来的创伤尤为严重。因未成年被害人身心所具有的特殊性、脆弱性等特点，此类案件一方面侦查取证难度较普通案件高，询问的过程需要更强的技术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因不法侵害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的身心创伤要求对其实施特殊救助。同时，在司法程序中的反复、多次询问也可能会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造成“二次伤害”。自2013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颁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等文件指导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并要求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要“继续推行“一站式”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办案机制，做实做好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工作”[[1]](#footnote-0)。本文将先对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作概念廓清，就这一机制在我国的提出以及实践发展进行梳理；其次，从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理论基础以及构建的现实意义的角度浅论其构建的必要性；最后，通过对域内外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实践的参考和分析，总结在具体构建中应当遵循的几个基本方向，并尝试给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机制运行路径，希望能为各地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构建提供参考和启发。

一、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概述

（一）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概念

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应当由“一站式”询问机制和“一站式”救助机制组成，此两者互为联系，且相互促进、相互包含。

“一站式”询问机制是指公安机关在办理涉及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尤其是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遵循“一次询问”的原则，秉承“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在专门的未成年人办案区内，采取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询问方式方法并对询问的全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将询问当时未成年被害人的回答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动作、语气、神态、表情等情况通过视听资料的形式固定下来，与询问后的笔录一起附卷以供后续进行调阅，减少因反复询问或失当询问对未成年被害人带来的“二次伤害”。

“一站式”救助机制要求，针对特殊的涉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尤其是强奸、强制猥亵等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提前介入公安机关对案件的侦办，监督并指导公安机关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侦查取证工作以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诉讼权利。在此之上，检察机关还可以整合司法、民政、教育、妇联、团委等相关部门，引入医疗、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社会机构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心理疏导、医疗救助、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一系列综合救助。

（二）我国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提出与发展

2013 年10 月，两高两部颁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办案机关询问未成年人要“考虑其身心特点”，并“采取和缓方式”。[[2]](#footnote-1)

2016年6月，在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30年座谈会上，时任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强调，办理涉未成年被害人案件要推行“一站式”询问机制。[[3]](#footnote-2)

2017年3月，最高检颁布《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确立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一次询问”原则。[[4]](#footnote-3)

2019年2月，最高检在《2018-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指出，推行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一站式”询问机制和“一站式”救助机制。[[5]](#footnote-4)

2018年5月 29 日,据最高检未检办主任郑新俭公开介绍，检察机关将通过逐步推行“一站式”询问机制来解决反复、不当询问未成年被害人的问题。[[6]](#footnote-5)

2018年5月，最高检就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关于全面建设“一站式”询问机制的建议的答复指出，当前全国已建立“一站式”办案区323个，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就进一步树立儿童利益最大化、加快推进“一站式”询问场所的建设、出台相关意见以及进一步加强救助工作这四个方面进行着力，推进构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7]](#footnote-6)

2019年12月，最高检邀请全国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构建的突出优秀检察机关在河南开封举办的“全国未检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专题研修班”上向全国检察机关未检部门提供示范指导并传授优秀经验。[[8]](#footnote-7)

（三）我国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实践

2015 年，上海市未检部门最先全面推动针对性侵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机制的构建和“一站式”调查取证场所的建设，形成了最早的“上海模式”。[[9]](#footnote-8)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开展合作共建，将对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的地点从公安机关的询问室转移到检察院内的未成年人专门办案区“心语工作室”。[[10]](#footnote-9)此后，全国各地开始推进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建设，形成一系列较为突出的地方实践。

2016年9月28日，江苏省淮州市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构建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区“暖阳之家”，要求公安机关接性侵女童案件报后第一时间通知检察人员提前介入监督指导。[[11]](#footnote-10)

2017年浙江省检察机关在属下的14个区县中实施试点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办案模式、推动在公安机关、医疗机构或检察机关中建设“一站式”专门询问场所。[[12]](#footnote-11)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与鄞州区第二人民医院合作，全国率先在医院内设置性侵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场所，单独开辟了心理治疗区，提供沙盘治疗、音乐治疗椅放松等服务。[[13]](#footnote-12)经最高检考察，列未全国未检创新实践基地并在全国推广。[[14]](#footnote-13)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检察院联合公安部门，在公安预审大队中设立“一站式”询问办案区域，由经验丰富的女性民警专职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15]](#footnote-14)

2018年3月起，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检察机关联合当地公安机关等多个机关部门共同制定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的试运行规则，与医疗、心理等跨专业机构签订相关操作协议与工作指引，以保障其设置于社区的“一站式取证与保护中心”的有效运转。[[16]](#footnote-15)

2019年6月，重庆市检察机关未检部门“莎姐未成年人关爱中心”依托重庆市中医院，建成了全国第一家省级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17]](#footnote-16)

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构建，具有充足的理论基础与迫切的现实意义，简而言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

1. 国家亲权理论

国家亲权理论认为，国家是未成年人最高的监护人，秉承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一方面对实施不法侵害的未成年人进行惩罚和教育，另一方面救助被不法侵害的未成年人并帮助其恢复。当未成年人受到不法侵害时，检察机关除了要依法追诉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还要关注和了解不法侵害对未成年被害人带来的创伤和不良影响。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我国法律监督机关，决定了其在案件诉讼中各个阶段环节的监督都应该贯彻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检察机关从事未检工作时，角色定位是“国家监护人”，而非简单的“国家公诉人”。[[18]](#footnote-17)基于此，未检部门作为检察机关中的独立部门，不仅要行使“国家公诉人”的司法职权，而且还应当符合“国家监护人”的角色定位，一方面确保侦查取证有效进行，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恢复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减少案件发生对其家庭的不良影响。

在司法实践中，因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等阶段对证据的证明力、证明能力以及全面性等要求的差异，往往需要对证据进行补充和补正，很可能需要对未成年被害人再行进行审问。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目的，就是要尽最大可能贯彻“一次询问”的原则，对取证、补证、固证等问题提出意见，确保证据收集的规格和质量，避免因诉讼阶段更替后的再次询问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或“多次伤害”。

1.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立了世界各国进行与儿童有关的活动的基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提出了纲领性要求，即应当把青少年儿童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性权益与身体健康这一人的最根本权益息息相关，这一权益一旦被侵害，将对未成年人带来巨大伤害，波及个人的生理、心理、道德、学业、发展等几乎所有方面。很多未成年被害人在长大成人后仍然未能治愈因早期被性侵而导致的成长阴影。为此，世界各国应遵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基本精神，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和制度设计，增加投入对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投入和预防成本，在严厉惩罚性侵犯罪人的同时注重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在诉讼全过程中的权益。此外，还需要严格落实各机关部门团体在性侵未成年被害人防控一体化中的职责，提升预防性侵案件的教育和宣传。

1. 我国法律与相关司法解释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都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作出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作单独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询问未成年被害人作特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宗明析本法制定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其合法权益并促进多方面的发展[[19]](#footnote-18)，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20]](#footnote-19)。

（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司法保护

1.“双向保护”原则的要求

“双向保护”原则要求办案机关在行使职权时除了要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外，也应重视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努力为其提供救助。[[21]](#footnote-20)检察机关通关贯彻以这一原则，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未检部门具有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业经验，其人员队伍除了需要具备基本的检察业务技能外，还接受犯罪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有效实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为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提供专业保障。

（1）防止“二次伤害”

由于“侦查、批捕、公诉、审判的独立性和分离性”[[22]](#footnote-21)的原因，同一案件中的同一未成年被害人可能需要接受不同司法程序阶段的询问。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询问会逼迫未成年被害人在逃离被侵害案发现场后，将未成年被害人又带回案发现场，在心理上再次体验被侵害的情绪，不停地回想被侵害的细节，这实际上是在案件以外给未成年被害人以案件所带来的痛苦。这种“二次伤害”、“多次伤害”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更严重的不良影响。

（2）消解“心理自责”

此项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性权利涉及一个人最为私密、关乎其根本尊严的权益；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尚未发育完全，对性和性侵害尚未形成稳定和正确的认识；再者，国内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贞操观念存在。因此，性侵害发生后，未成年被害人可能会陷入极度恐惧，不敢向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袒露受性侵害的事实、指控性侵害嫌疑人。长此以往，因恐惧情绪无法得到排解和疏导，很容易会形成转化为委屈和愤怒的情绪。这种情绪投射到自己身上，便会引发不同程度的“心理自责”，可能会导致情感障碍、抑郁、自残甚至自杀的严重不利后果。

2.对未成年被害人特殊诉讼权利的保护

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也有类似保障规定，如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陪同以保障其诉讼权益、询问女性未成年人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等。这些规定在旨在平衡调整未成年被害人与成年被害人的身心成长程度落差，强化保护未成年人，实现其权益的最大化。

（三）确保案件诉讼的顺利进行

强奸、强制猥亵等性侵害严重践踏被害人的尊严，极大损害被害人的身心健康，而未成年人被害人比成年被害人遭受的伤害更甚。此外，当前社会对性的尴尬一定程度上带来对未成年人性教育的缺失，导致了未成年被害人在遭受到性侵害时“不知危险正在发生，不知权益已受侵犯，不知求助如何展开”[[23]](#footnote-22)。同时，我国保守的贞洁观念也使得未成年被害人在遭受性侵害后感到羞耻，不敢告诉父母及亲属，不愿意向公权力机关求助，这都给司法机关对保护和救助性侵未成年被害人带来困难。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隐案率高、取证难的问题，因此如何引导未成年被害人自愿、全面作出被害证言成为案件诉讼的重要一环。

另一方面，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生后的短时间内，未成年被害人对被侵害的记忆较为清晰、完整，对于案发当时情况的描述也较为详尽、准确，可信度也更高，因此一般可以认为其作出的首份询问笔录有较高的审查价值。在司法实务中，强制猥亵、性侵等对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所形成的直接证据往往较少，很大程度上要以未成年被害人的证人证言以及作证时的情绪反映来判断。公安机关作为首次询问未成年被害人的办案人员，其制作询问笔录的全面、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的后续过程能否顺利、有效开展。

（四）顺应国际司法潮流的发展

全世界范围内总体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和救助的趋势在逐渐加强，域外国家和地区对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构建的起步较早，形成了一系列可供借鉴的有效经验和通行做法。

1.域外保护实践考察

在我国台湾地区，基于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立法会”制定包括“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在内的相关法律，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来降低“二次伤害的”程度。台北市政府从2007年便开始构建“性侵害案件一站式服务” 机制，建立“性侵害防治中心”，规定对办案人员开展防范性侵的培训，并提出尽量选拔已婚女性警察、检察人员的要求。在案发后，基于网络的整合处理，实行专人专责，联动警政、检察、医疗、社政围绕被害人展开服务，减少反复陈述作证，避免就同一问题多次发问，降低询问次数，并在询问过程中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将相关资料全部向检察和审判人员提供。[[24]](#footnote-23)

在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社会福利处以及警务处均设立儿童保护科，负责办理儿童性侵害案件，为受侵害儿童实施救助服务。对为成年被害人的询问安排在专门的“家具录影室”中，由受过专门培训的警察办案人员和专业社工共同完成，且询问遵循“一次会谈”与“保密”的原则。[[25]](#footnote-24)

日韩地区对被性侵的未成年被害人建立了相关的被害人咨询室、援助中心、对策室以及支援网等机构。日本政府部门在1983 年建立了东京强奸救援中心作为专门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机构，并配置特殊的办案车辆以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韩国对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指导和庇护场所则通过非营利组织进行管理。[[26]](#footnote-25)

在英美，政府针对性侵儿童案件建立专门的处理中心和咨询中心，要求案件调查应当在特别场所、由经过特殊训练的警察人员进行，并就未成年被害人在询问过程中的保护组建专门的跨学科专业团队。[[27]](#footnote-26)

2.域内外实践仍存在差距

从历史纵向来看，虽然我国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和救助措施和机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但是横向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和短板，尤其在在理念原则、场所设置、人员配置、环节设计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们在探索构建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过程中，应当一方面始终遵循国际公约准则、参考通行做法，另一方面并结合本国国情、区域特点以及基础条件进行本土化的移植改造，力求高效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构建的探索

（一）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构建的基本方向

纵观域内外的相关实践，对于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应当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构建方向：

1. 专门化

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构建的专门化是指应当设立专门的部门、人员进行涉未成年被害人案件的侦查、批捕、起诉、审判等环节。这是因为同一办案人员可以减少因案件转介所造成的重复翻阅和听取，防止因多次被要求回忆案发时受侵害情况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另一方面专门的办案人员能够通过对同一类型案件的办理，总结出此类案件的特点和抓手，积累同类型案件办理的经验，从而提高办案的专业性、高效性。

1. 针对性

不同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案情不同、受侵害程度不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询问取证和帮助救助，此时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作用尤为重要，在进行询问取证和综合救助前，应当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先行的心理评估测试以及社会调查，了解其受侵害程度、侵害对其心理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轻重，再根据其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状况、交友情况、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因素进行综合判定，确认其当下处于一个怎么样的心理状态和环境，从而在听取心理咨询师、社工等人员的专业意见的基础之上得出在询问取证前是否需要实施心理干预和其他的一系列救助，最大程度恢复未成年受害人的创伤，防止“二次伤害”，提高询问取证的效率，杜绝救助处理的形式化、机械化。

1. 及时性

（1）及时发现、介入

在面对涉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公安机关不应就案办案，而要把视角放在如何及时发现和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上，重点解决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受理难等问题。尤其是强制猥亵、强奸等性侵未成年被害人在受侵害后容易产生羞耻心理，不愿报案，给案件的发现和侦查带来难度。这就要求公安机关要积极发挥“强制报告”等制度的作用，在侵害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发生后的短时间内开展案件侦办；公安机关在发现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侵害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应当及时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2）及时询问取证

未成年人思维和记忆体系尚未完全成型，侵害发生后经过时间过长，未成年被害人可能会出现遗忘、记忆混乱混淆的情况。此外，未成年被害人心智尚未成熟，可能会受到因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周围的人的误导，对案发时的记忆，从而对侦办人员了解案件案情、还原案发情况产生影响。

性侵未成年受害人案件的证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犯罪嫌疑人实施侵害后残留在受害人身上的体液、毛发等痕迹，若在一定时间内未及时进行提取保存，很可能就会出现毁损灭失或证据能力、证明力大幅下降的情况。

（3）及时帮助救助

对未成年被害人帮助救助的及时性是由未成年被害人健康、成长以及诉讼权益的时间性来决定的，因为一旦在某个时点或阶段无法实现，这种权益可能就会永远失去或减损，造成在时间上不可逆的不利影响。

在案件时乃至发生后的短时间内，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心理痛苦最为显著，承受的心理压力最为严重，此时是对其进行心理干预的黄金时间。等到审查起诉阶段，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形成一定的平复和心理障碍，此时再让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安抚，其治疗效果便大打折扣。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在遭受性侵害后，随着生理、心理创伤的恶化，容易在内心中堆积对侵害人的仇恨与愤怒，但因不愿意报警或侵害人未受到及时的惩治，将这种负面情绪投射到自己身上，不停进行自我攻击，进而愈演愈烈，发展成自残或者自杀等严重后果。此时，及时对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心理干预，排解和疏导这种负面情绪就尤为重要。另外，对于在医疗、经济、法律、监护等方面具有困难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及时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医疗救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经济救助、监护救助，防止出现未成年被害人无处医治、生活无着、无人维护、无人监护的情况。

1. 科学性

在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构建中所应遵循与未成年人有关的科学，即青少年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和内容。

（1）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

未成年人处于成长阶段，身心尚未完全成熟，与成年人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采用询问成年被害人的方式方法来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询问并非一定适合。侦办人员在询问时，不能简单搬运询问成年人的那一套方法路子，正确理解未成年人在思维、逻辑和认知能力方面的特殊性。选派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询问的人员首先应当熟悉涉未成年被害人案件业务；其次应对了解清楚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再次应善于倾听，对未成年人有亲和力，能够尽量打消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顾虑，缩短与其的心理距离，提高询问的效果，全面还原侵害案件事实细节。

1. 顺应遭受侵害后未成年人的正常心理反应

未成年被害人在遭受强奸等性侵害后，会在短时间内产生恐惧震惊、绝望、耻辱、悲痛、愤怒、焦虑、紧张等强烈负面情绪，询问人员要切实了解未成年被害人案发后渴望被倾听、被理解、被接受、被帮助等心理需求，这要求询问场所的建设要营造一种舒适、亲和的气氛，“让未成年人在心理上感到安全”[[28]](#footnote-27)，并根据各个环节的不同需要，提供符合心理特点的不同环境。

（3）发挥相关专家的专业作用

公安、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条件配备不足，忙于日常案件办理，可能无法分出精力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心理疏导，同时办案人员由于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心理疏导能力及技巧仍有待提高，若咨询过程中出现差错，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询问和取证以外的处理事项，应转介给相关专业人员处理，避免因救助不专业导致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案外伤害。另外，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具体刑事案件过程中，应保持相对的中立和客观，把握好案件双方之间的平衡关系，过多地参与对被害人的救助可能会影响办案人员的专业判断。

心理疏导和社工服务作为专业性较强的事项，可以通过政府集中购买服务的形式交给专业机构和人员。政府购买形式一方面提高服务的专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控制成本。此外，还要积极听取专家意见，使询问场所、询问人员、询问环节等可能影响询问取证效率的因素事项的设置还应符合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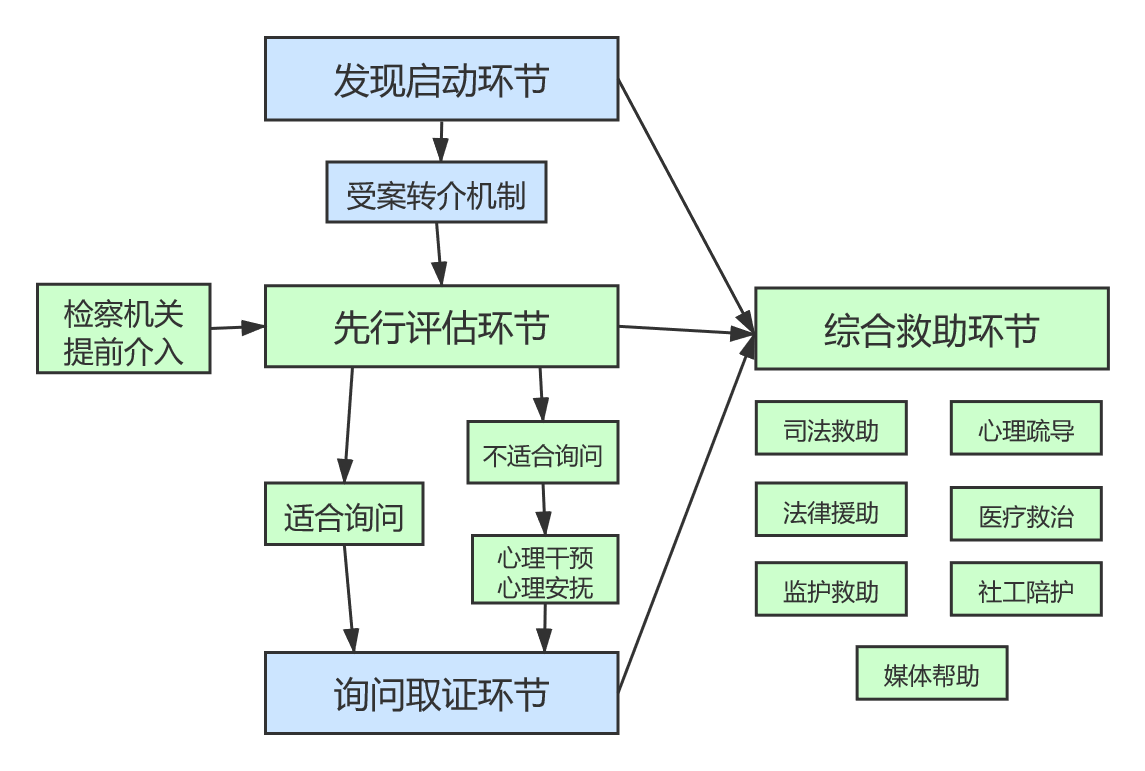
1. 联动性

对于未成年被害人受到性侵害的案件，司法机关惩处犯罪分子，虽然可以给予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一定程度上的宽慰，但是未成年被害人因侵害所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创伤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修复，一部分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仍然要承受遭受侵害后因经济困难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因心理障碍未得到有效排解而不断恶化的打击。“一站式”取证机制解决的仅仅是在诉讼程序上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问题，而无法解决其因性侵害行为给未成年被害人而带来的生存、健康、发展等现实困难。为此，在“一站式”取证机制的基础上，还需要构建“一站式”救助机制，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解决在司法诉讼保护以外的问题。

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所涉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教育部门、民政部门、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妇女儿童保护组织、医疗机构、心理康复机构、青少年社工组织等多方单位，仅凭其中一方或几方无法很好地实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救助，需要各机关部门以及各社会力量的联动合作与通力配合。社会各方、各部门职能不同，缺乏沟通和协作，时常“各自为政”，不问整体，只看局部，常常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力量相对分散，此时就需要检察机关主动积极作为，将社会各方、各部门协调联系起来，调动各方资源和人力，形成司法、教育、民政、妇联、团委、社会团体、企业共同参与的一体化救助保护网络，尽最大努力促进未成年被害人的恢复，帮助其家庭战胜案件发生所带来的阴影创伤，渡过难关。[[29]](#footnote-28)从内容上看，对于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 部分是属于检察机关职能范围或是与其他保护部门均须履行的法定职责， 如隐私保护、司法救助；部分是检察机关力所不能及的，如医疗救治、监护救助。因此，检察机关应当立足检察职能，主动承担起承上启下、牵头拉线的责任，整合各职能部门资源，并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

（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运行路径

通过对机制构建的次序性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机制的运作至少应当包括四个环节，即发现启动环节、先行评估环节、询问取证环节以及综合救助环节。根据机制构建的目的性进行分类，启动环节和询问取证环节（如图蓝色部分）应当构成“一站式”询问机制的内容，而先行评估环节和综合救助环节（如图绿色部分）则应该划分到“一站式”救助机制当中。具体运行路径及其关系如下图。



（蓝色部分构成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机制，绿色部分构成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救助机制）

1. 发现启动环节

公安机关在收到涉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发生的检举、报案、指控时，需要对案情作初步判断分析，若案件案情可能属于强制猥亵、强奸等性侵未成年人情形的，应当尽快通知公安机关内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的专办人员并移送相关案件材料。

（1）专人专办机制

推动公安机关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专人专办。对于涉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公安机关应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案发数量情况，同时统筹当地人力条件，抽调优秀办案骨干，设立专门的人员或部门进行办理。实践中，可参照某些地方实践，针对不同地区发案数量不平衡的情况，在案件数量较多的派出所成立专门办案组，案件相对较少的派出所，在所内设立专人办理即可[[30]](#footnote-29)。此外，还应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检察性侵专办制度和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中的性侵专门合议庭或审判员。

1. 专门培训机制

对办案人员应该每年进行不定期的、不少于一定时限的专门培训，使其了解一定的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询问技巧等知识，另外还需系统性掌握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理念、原则、方法和步骤。

（3）受案转介机制

①材料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受案人员在收到报案或者侦察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案件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应当尽快将案件材料移送给办理此类案件的专门人员或部门，以便推进后续办案工作。

②保障福利时间。公安机关主管部门应当保障涉未成年被害人办理的人员或部门具有基本的福利待遇，同时使其工作范围与一般刑事案件分离开来，保证专门办案人员具有充足的精力和时间办理涉未成年被害人类案件。

1. 先行评估环节

因此，公安机关的专办人员在收到案件材料后，应该首先根据类似案件办理的经验对案情作基本的掌握，其中着重关注未成年被害人的受侵害类型和程度；其次，根据案件办理的需要通知合适成年人、心理咨询师以及医疗人员到场为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心理测试、社会调查以及医疗救助；再次，及时通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指导并监督之后的询问取证工作。检察机关在收到公安机关的案发报告后，应迅速制定方案，做好风险预判，尽快到场开展提前介入和法律监督。

（1）提前介入机制

侦办人员在发现涉未成年被害人案件案情属重大、疑难、复杂时，应当及时通知检察机关进行提前介入，检察机关应积极就案件办理提出指导和建议。公安机关在发现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应第一时间通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若检察机关因条件限制未能尽快到场，等待时间过长不利于案件开展而询问的，公安机关在询问前应打开同步录音录像设备，同时通过电话与检察机关取得联系，确保检察机关能够实时视听询问过程，并通过电话指导公安机关开展询问。对于办案场所条件有限的，公安机关可以充分利用移动通信设备等的录音录像功能行弥补，实现线上先行提前介入。

①参与制定询问清单。检察机关可以对公安机关询问未成年被害人的问题设置提出建议，尽量做到应问尽问，询问笔录经一次制作即达到全面、准确，符合后续诉讼阶段应该达到的证据要求。

②强化询问特殊规定的法律监督。针对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法律具有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陪同以及女性工作人员在场等特殊规定。[[31]](#footnote-30)这些规定是有利于切实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因此，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的过程中，应当密切对公安机关在询问取证中的活动进行监督，严格贯彻落实这些事项的完成此外，公安机关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调查取证应遵循“一次询问”原则，并考虑其身心特点，“采取和缓的方式”[[32]](#footnote-31)。若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询问过程中有故意反复询问或者不当询问的情形，可能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和产生不良影响的，同样应当及时开展进行法律监督。

（2）心理测评机制

公安机关可以与学校、医院以及心理辅导机构等达成合作，聘请心理咨询师、社工，建立相关专家名录，附各心理咨询师、社工的基本情况、擅长领域以及联系方式。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配备，应以基层派出所为基本单位，并根据该区域同类案件案发情况进行合理数量配备。同时，采用定点驻所的模式，若干心理咨询师、社工固定对同一派出所的案件服务，一方面确保案发后心理咨询师、社工能够及时到位开展救助，另一方面保证其服务的专门性、专注性。在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询问前，询问人员先请心理咨询师、社工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安抚和心理测试，形成初步的心理人物描绘，为后续的询问取证作重要参考。

（3）社会调查机制

合适成年人、心理咨询师、社工应当与主动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了解未成年被害人的详细情况，重点关注被害人家庭经济状况是否困难、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是否和睦，是否具备基本生理健康常识，在遭受侵害后的情绪反应，案发后父母对被害人的反应等事项，对未成年被害人作初步的社会人物描绘，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最后将社会调查报告和心理评估意见所反映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专业意见，确定未成年被害人是否适合马上接受询问、是否需要对未成年被害人实施心理干预等，为询问人员判断和决定提供参考。

3.询问取证环节

根据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人在光线通透明亮，视野开阔的场所中更容易降低对他人的戒备、放松其紧张情绪，打开心扉进行表达；而当人需要褪去衣物进行检查身体的时候，相对隐蔽、隔离的环境可以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1）询问的方式方法

询问人员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询问所使用的语言应当做到简单、易懂，符合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特点，不得采取诱导、催促、施压等不当方式进行询问取证。对未成年被害人在回答中未充分叙述的重要细节，侦查取证人员能够通过提示、比喻等方式辅助未成年被害人进行表达，从而对案件事实进行了解。侦查取证人员在充分查明案件事实的同时，也要深入了解侵害对未成年被害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以便在后续诉讼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和救助救济。

（2）询问场所的建设

对未成年被害人询问场所的建设，首先应当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体察未成年人的基本心理特点和受侵害后所产生的心理波动，紧紧围绕“询问案情”和“验伤提取”这两大基础功能开展，在此之上要有效配合侦办人员、医疗人员以及心理咨询师，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①办案场所的选址。首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取证应当在单独的办案场所中进行，不宜将未成年被害人带到一般的案件办理场所进行询问。其次，办案场所的地址应当对外保密，减低因询问取证对未成年被害人隐私、名誉的损害；再次，地点不宜过于偏僻，交通运输相对便捷，确保侦办人员和医疗、心理、司法等相关救助人员能够快速便捷到达开展相关工作。

②办案场所的室内架构。办案场所内的室内架构应当至少包括“询问取证区”和“提取验伤区”两个部分。[[33]](#footnote-32)“询问取证区”的室内装修应当采光通透，采取柔和温馨的色彩色调。“询问取证区”中还应配有同步录音录像设备，在侦办人员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询问时启动该设备并与检察机关一端的设备保持连接，传输实时画面声音。“询问取证区”中放置的桌椅应当采用儿童风格且数量不宜过多，避免过于拥挤。询问人员与被询问人员椅子的间隔最好保持约不大于一米距离，两者间设置呈45度角且无其他障碍，一方面消除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防备、拉近话者和听者间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在询问时给询问人员和心理咨询师观察未成年被害人的“微动作”、“微表情”提供方便。此外，在实践中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询问取证区”配置一定量的卡通玩偶或心理测试所需要的简单道具；而“提取验伤区”应当做到相对隔离、隐蔽，采取单一冷色光照明，面积不宜过大，最好可以设置在单独的卫生间或者别室进行，条件有限的单位可以仿照医院住院区或学校保健室采用隔离帷帐进行围蔽。同时。“提取验伤区”内应放置一定量用于验伤器材、基本药物以及清洗设备，方便医疗人员开展初步验伤、实物证据提取以及基础医疗救助。

（3）询问人员的选派

①专业知识。询问人员应当具有一定的心理学、教育学及医学的专业知识，同时具有丰富的涉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办理经验，掌握询问的技巧和方法，懂得通过提示性语言和行为表达帮助未成年被害人流畅、全面地重述案发情况。

②身份性格。实践中，受到强制猥亵、强奸等性侵害的女性未成年被害人一般会对陌生男性产生排斥，不愿意在其面前描述受到性侵害的经过和详情，因此询问人员中身最好具有年纪较大的已婚已育女性。女性侦办人员更熟悉女性未成年被害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更为容易拉近与女性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距离，更有利于查明案情细节。性格温和亲切，做事稳重，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更佳。

➂着装特点。过于严肃的着装，容易让未成年被害人内心感到压抑。因此询问人员在询问取证过程中，应尽量穿着便服，降低未成年被害人的戒备，提高询问效果。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时应当注重保护被害人隐私，不宜采取穿着警服、驾驶警车等方式进入未成年被害人所在的学校、医院、居住小区进行取证。

1. 综合救助环节

综合救助环节是“一站式”救助机制的主要环节，主要包括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医疗救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工陪伴、媒体帮助等方面。

（1）医疗救治

医疗机构和部门应在急诊大厅内建立受侵害后医疗“绿色通道”，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提供免挂号、免排队、减免医疗费的服务，同时还应发挥以人为本和救死扶伤的精神，对受侵害未成年被害人先行治疗、先行垫付。未成年被害人在强奸、强制猥亵等性侵害案件一般都有遭受身体创伤，严重的甚至会感染性病和怀孕，一方面需要进行紧急而准确的治疗，并且对被害人的身体伤害需要及时检查、验伤，固定侵害证据。在接到案发通知后，医疗人员第一时间到场为未成年被害人开展验伤鉴定、身体检查以及体液毛发提取，并在询问进行时随时关注并监控其伤势变化。

（2）心理疏导

向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提供全程心理疏导救助机制。心理康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需要专人的正确引导和长时间的自我调节。心理疏导不能仅限于案发后的侦查询问阶段进行，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案件审理甚至审判后的阶段仍然不可缺少。心理咨询师应当及时跟进，随时监控，避免未成年被害人心理状况向着“恶逆变”的方向发展。

①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一、侦查询问阶段：在开展询问前，心理咨询师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先行评估是否适合马上接受询问，向询问人员提出专业意见；在开展询问时：心理咨询师密切观察未成年被害人的表情和情绪，若其存在不适合继续接受询问的情况，立刻通知询问人员暂停并处理；二、审查起诉阶段：心理咨询师在询问前先行评估环节发现未成年被害人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应当建议后续对其进行周期性、针对性的心理治疗矫正。应当由政府制定有资质的权威性专业心理辅导机构负责后续，费用由国家与专项救助基金承担。尽量由同一团队全程跟进服务，主动了解生活状况，及时申请心理辅导，就被害未成年人身心情况制作阶段性评估报告；三、开庭审理阶段：心理咨询师应全程陪同未成年被害人，在开庭时为其作心理干预和庭前放松，且在开庭中过程中进行观察，一旦发现未成年被害人心理状况不适合继续开庭的，提出未成年被害人退庭或暂时休庭为其作心理辅导的意见。

②对共同生活的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在案件发生后，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会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与未成年被害人同样的“替代创伤”，被害人家属情绪的失控往往也会给被害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被害儿童的心理健康，因此对被害人家属进行相应的心理辅导，可从另一角度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此时，心理咨询师需积极引导其保持冷静状态，提升他们的情绪控制能力防止因成年家属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责备和惩罚而造成“二次伤害”。同时，对成年家属开展“亲职教育”，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回归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避免因案发后教育方式的不当造成后果更加严重的“加重伤害”。

（3）法律援助

①对法律援助制度作完善规定。刑诉法规定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从其接受第一次讯问或被实施强制措施之日开始[[34]](#footnote-33)。然而就未成年被害人，法律仅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帮助其落实法律援助，而未规定法律援助的起始时间，违背“双向保护”的原则精神。实际上，在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其接受第一次询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此外，未成年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还需要满足经济困难和主动申请的条件。[[35]](#footnote-34)后续制定的法律应当对此进行完善，尽量简化申请程序，让当事人能更快捷地获得法律援助，有效加强司法救助的工作效率，使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平等而全面的保护。

②健全建设性侵未成年被害人援助律师行列。对于法律援助机构选派的援助律师，应该对其进行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生理学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增强法律援助的专门化、规范化水准，为性侵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

（4）司法救助

①保障未成年受害人的特殊诉讼权利。前文已提，不再赘述。

②完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知情权。公安、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向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告知其拥有的相关诉讼权利，及时释明法律规定。对于在行使诉讼权利过程中需要进行的操作步骤，公安、检察机关应当积极提供答疑和指导。

③赋予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陈述意见权。对于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实行认罪认罚具结、是否对其表示谅解等意见，检察机关应当严格对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听取，尤其是要对其原本表达的话语进行记载，不得故意进行转述。对于强奸、强制猥亵等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往往需要背负较大的心理负担。陈述意见权的行使能够为这种心理负担提供排解出口和表达倾述的机会，提高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度和受尊重感以及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④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庭审特殊保护。被害人陈述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证据类型，在强制猥亵、强奸等性侵害案件中发挥独特重要。前文已述，据以认定性侵案件的直接证据往往较少，而在案件发生时，被害人是最直观的证人，因此需要其证言完成法庭举证。未成年被害人若亲自出庭作证，需要直接面对曾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嫌疑人。这种会面可能会使未成年被害人再次回忆侵害过程，重新揭开其心理伤疤。因此，为了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审判机关应当允许未成年被害人在原则上不出庭作证，尽量通过在“一站式”询问机制中形成的询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等证据完成法庭举证；即便需要未成年被害人出庭，作证时也应尽量使用远程视频方式，且对其外貌、声音作特殊处理。

（5）经济救助

①设立专项救助基金。政府应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经济救助纳入财政支持和保障范围，建立健全专门的未成年人专项司法救助基金。在案发后，需要接受紧急医治的未成年被害人由医疗机构实行先行收治、先行垫付医疗费，贯彻“生命至上”精神，优先保证未成年被害人生命健康。在此之后，由政府指定的专业、权威性医疗、心理机构跟进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医疗救助和心理疏导，力求最大程度减少侵害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不利影响，尽最大努力促进其恢复。

②建立国家补偿制度。若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获得的赔偿无法支撑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支出，则国家财政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经济补偿，以避免未成年被害人陷入生活无着的境地。有学者认为，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的犯罪人往往自身经济能力有限，无法充分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赔偿，则司法机关一般会将犯罪人对未成年被害人所作出赔偿的态度作为情节考虑，加重犯罪人的刑罚以减少其赔偿的数额[[36]](#footnote-35)，但对犯罪人刑罚的加重固然能够给予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以心理安慰，但并无助于其救助和恢复。此外，相关司法解释仅规定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害人因遭受人生损害而支出的康复医治费用[[37]](#footnote-36)，但是此处的康复医治费用否包括心理康复医治费用则未明确规定。未成年被害人相比成年被害人，在年龄和心理承受程度都明显脆弱，在遭受性侵害后的治疗、恢复的成本和时间也更多，还可能导致心理抑郁、不可逆精神损伤，严重者还会导致自残甚至自杀的不利后果。国家行使制定、执行刑罚制裁不法侵害人的权力，亦应提供救助促进被侵害人的恢复；若国家疏于行使救助恢复的义务，被害人有权提出国家予以补偿的要求，这也是“国家责任说”的观点要求。

1. 监护救助

在这十几年，社会上开始多次出现通过利用监护关系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害甚至是性侵害的案件。若该侵害人仍担任监护人，可能会继续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侵害，对其身心健康带来巨大摧残。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必要由相关机关部门共同对未成年被害人实施临时监护救助，保证其可以接受及时、妥当、充分的照看，防止侵害人再次实施侵害。

①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临时监护制度。未成年被害人除侵害监护人以外暂时没有监护人适格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临时监护的场所和条件[[38]](#footnote-37)，保证其临时性生活照顾及时反映未成年人的诉求及身心状态，不至于落得无人监护、生活无着的境地。对于未成年被害人需要办理转学、异地入学等手续的，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应当予以保障。

②依法快速办理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将法律有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事项，及时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他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家属，并积极建议并引导其向人民法院提交撤销侵害监护人资格的申请。人民法院应本着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从快从速办理监护人资格撤销案件，并妥善为未成年被害人制定适合其成长和发展的监护人。

1. 社工陪护

引导未成年被害人参加社区公益志愿活动，有助于其走出受侵害的阴影，重建人际关系，重返校园和社会。被性侵的未成年被害人很可能受到来自家庭、 社会的二次伤害，从而否定自我、摧残自我。除了定期提供心理疏导或心理治疗外， 可以为其聘请专业的司法社工，参与全程陪护，陪同其制作笔录、陪同其出庭、 陪同其接受治疗，提供温馨、舒适的陪伴，治愈其心灵创伤。

1. 媒体帮助

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等事关未成年被害人隐私、名誉的敏感案件，新闻媒体应从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发，密切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社会舆情监控，对相关案件的报道予以克制，避免过度渲染事件，又或者在新闻报道中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姓名、相貌、声音、住址、学校和位置等进行模糊化处理，尽量减少案件发生对未成年被害人不良影响。

对于经济、医疗、法律等方面上存在困难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新闻媒体可以在切实保护其隐私、名誉等合法权益的前提上，通过自身传播优势和去到，呼吁社会各界为其提供帮助，促进“一站式”救助机制的形成，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尽快回复正常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减少因受侵害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渡过难关。

此外，可根据实际情况，利用单位、社区的微信、微博、短信公众平台，向未成年人及其家庭进行法治宣传，推送相关法律规定和安全信息，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在发生危险侵害时保护自身安全，妥善保留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参考文献

[1]史卫忠. 努力推进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J].人民检察,2019(03):51.

[2]何勇海. 未成年人“一站式”询问值得推广[N].工人日报，2017-11-23(003).

[3]王治国，戴佳，林中明. 最高检：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关爱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互联网站(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1606/t20160602\_119278.shtml)，2020年7月26日浏览.

[4]谢文英. 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建议全面建立处理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机制，最高检答复——加快建设功能齐备信息互通的一站式询问场所[N].检察日报,2018-11-26(005).

[5]杜晓，杨映瑜. 多措并举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互联网站(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1902/t20190228\_409725.shtml），2020年7月26日浏览.

[6]杜晓，杨映瑜. 最高检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等多项制度——专家解读：多措并举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N].法制日报，2019-2-28(004).

[7]郑州检察. 嵩山“论剑”，问道“未检”——全国未检创新实践基地研修班在河南登封举办.腾讯网(https://new.qq.com/omn/20191212/20191212A0JK3W00.html)，2020年7月26日浏览.

[8]樊荣庆，钟颖，姚倩男，吴海云，徐衍. 论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体系构建——以上海实践探索为例[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02):32-43.

[9]张珍，韩雪娇，郎建强. 淮安检察“检护女童”传递温情[N]，江苏法制报，2017-3-2(001)

[10]孔令泉，胡铮. 浙江省法学会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研究会成立两年来，一批研究成果获最高检肯定 法学研究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N].民主与法制时报.2017-10-26(003).

[11]郑赫南. 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事)例[N].检察日报，2017-12-29(002).

[12]王学进. “一站式”询问有助于保护未成年被害人[N].宁波日报，2017-11-29(016).

[13]李尖. “双向保护”惩防 引入人格甄别 温州未成年人帮教“有温度”[N].温州日报，2018-5-30(005).

[14]杨阳洋，郎方. 盘龙未检探索“一站式”取证 不让未成年被害人受二次伤害[N].云南法制报，2018-5-28(004).

[15]王丽丽. 全国人大代表收到最高检“第二次答复”.最高人民检察院互联网站(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2004/t20200427\_459804.shtml)，2020年7月26日浏览.

[16]管晓昕,林莉. “一站式”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办案模式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8(29):93-94.

[17]郭紫棋,林颖慧. 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基于台湾地区台北市“性侵害案件一站式服务”之启示[J].人民检察,2018(14):37-40.

[18]兰跃军. 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立法与司法保护[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119-183.

[19]赵东方. 性侵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20(01):60-64.

1. 史卫忠.努力推进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J].人民检察,2019(03):51. [↑](#footnote-ref-0)
2. 何勇海. 未成年人“一站式”询问值得推广[N].工人日报，2017-11-23(003). [↑](#footnote-ref-1)
3. 王治国，戴佳，林中明. 最高检：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关爱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互联网站(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1606/t20160602\_119278.shtml)，2020年7月26日浏览. [↑](#footnote-ref-2)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 129 条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以一次询问为原则，尽可能避免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公安机关已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并制作笔录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重复询问”，第 130 条也明确提出尽量避免在检察环节重复询问未成年人。谢文英. 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建议全面建立处理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机制，最高检答复——加快建设功能齐备信息互通的一站式询问场所[N].检察日报,2018-11-26(005) [↑](#footnote-ref-3)
5. 杜晓，杨映瑜. 多措并举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互联网站(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1902/t20190228\_409725.shtml），2020年7月26日浏览. [↑](#footnote-ref-4)
6. 杜晓，杨映瑜. 最高检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等多项制度——专家解读：多措并举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N].法制日报，2019-2-28(004). [↑](#footnote-ref-5)
7. 谢文英. 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建议全面建立处理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机制，最高检答复——加快建设功能齐备信息互通的一站式询问场所[N].检察日报，2018-11-26(005) [↑](#footnote-ref-6)
8. 郑州检察. 嵩山“论剑”，问道“未检”——全国未检创新实践基地研修班在河南登封举办.腾讯网(https://new.qq.com/omn/20191212/20191212A0JK3W00.html)，2020年7月26日浏览. [↑](#footnote-ref-7)
9. 樊荣庆，钟颖，姚倩男，吴海云，徐衍. 论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体系构建——以上海实践探索为例[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02):32-43. [↑](#footnote-ref-8)
10. 同注释8 [↑](#footnote-ref-9)
11. 张珍，韩雪娇，郎建强. 淮安检察“检护女童”传递温情[N]，江苏法制报，2017-3-2(001) [↑](#footnote-ref-10)
12. 孔令泉，胡铮. 浙江省法学会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研究会成立两年来，一批研究成果获最高检肯定 法学研究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N].民主与法制时报.2017-10-26(003). [↑](#footnote-ref-11)
13. 郑赫南. 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事)例[N].检察日报，2017-12-29(002). [↑](#footnote-ref-12)
14. 王学进. “一站式”询问有助于保护未成年被害人[N].宁波日报，2017-11-29(016). [↑](#footnote-ref-13)
15. 李尖. “双向保护”惩防 引入人格甄别 温州未成年人帮教“有温度”[N].温州日报，2018-5-30(005). [↑](#footnote-ref-14)
16. 杨阳洋，郎方. 盘龙未检探索“一站式”取证 不让未成年被害人受二次伤害[N].云南法制报，2018-5-28(004). [↑](#footnote-ref-15)
17. 王丽丽. 全国人大代表收到最高检“第二次答复”.最高人民检察院互联网站(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2004/t20200427\_459804.shtml)，2020年7月26日浏览. [↑](#footnote-ref-16)
18. 参见张寒玉、王英著：《未成年人检察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7年版，第301页。 [↑](#footnote-ref-17)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条：“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footnote-ref-18)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 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平等地享有权利。” [↑](#footnote-ref-19)
2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4调：“对于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坚持双向保护原则，在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时，也要依法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footnote-ref-20)
22. 王学进. “一站式”询问有助于保护未成年被害人[N].宁波日报，2017-11-29(016). [↑](#footnote-ref-21)
23. 管晓昕,林莉.“一站式”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办案模式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8(29):93-94. [↑](#footnote-ref-22)
24. 郭紫棋,林颖慧.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基于台湾地区台北市“性侵害案件一站式服务”之启示[J].人民检察,2018(14):37-40. [↑](#footnote-ref-23)
25. 兰跃军.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立法与司法保护[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119-183. [↑](#footnote-ref-24)
26. 樊荣庆,钟颖,姚倩男,吴海云,徐衍.论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体系构建——以上海实践探索为例[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02):32-43. [↑](#footnote-ref-25)
27. 兰跃军.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立法与司法保护[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119-183. [↑](#footnote-ref-26)
28.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 14 条：“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律师应当坚持不伤害原则，选择未成年人住所或者其他让未成年人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性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被害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或者所在学校、居住地基层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等有关人员到场，并将相关情况记录在案。” [↑](#footnote-ref-27)
29. 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第八项：“推动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借助社会专业力量的长效机制。大力支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主动与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机构链接，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心理疏导、观护帮教、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等工作，交由专业社会力量承担，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专业水平，逐步建立司法借助社会专业力量的长效机制。” [↑](#footnote-ref-28)
30. 上海市金山区院推动区公安分局，由未成年人案件专办民警负责成年人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整个侦查过程; 上海市奉贤区院利用区刑事司法例会，推动区公安分局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归口于案审未成年案件办案组。樊荣庆,钟颖,姚倩男,吴海云,徐衍. 论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体系构建——以上海实践探索为例[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02):32-43. [↑](#footnote-ref-29)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footnote-ref-30)
3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第二款：“询问未成年人，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采取和缓的方式进行，防止造成进一步伤害。” [↑](#footnote-ref-31)
33. 根据前述，香港地区的专门取证场所“家庭录影室”包括会客室、谈话室、法医检查室和卫生间四个部分。实际上，会客室和谈话室是为了实现询问取证的功能，而法医检查室和卫生间是基于为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实物证据提取和验伤的需要而设。鉴于各地办案条件不一的考虑，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无法完全备齐此四个部分，因此在进行“一站式”办案场所的室内架构时只要能够实现“询问取证区”和“提取验伤区”的功能即可。 [↑](#footnote-ref-32)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第三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footnote-ref-33)
35.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footnote-ref-34)
36. 赵东方.性侵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20(01):60-64. [↑](#footnote-ref-35)
37.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31条：“对于未成年人因被性侵害而造成的人身损害，为进行康复治疗所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footnote-ref-36)
38. 有学者认为，在实践中，可以采取家庭寄养、自愿助养、机构代养或者委托政府指定的寄宿学校安置等方式，对其进行紧急庇护以及临时生活照料。郭紫棋,林颖慧.被性侵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基于台湾地区台北市“性侵害案件一站式服务”之启示[J].人民检察,2018(14):37-40. [↑](#footnote-ref-37)